

目錄 Contents  
02 | 2012

- 高牆處處——倒退中的香港新聞自由 / 杜耀明 p. 2-3
- 北大人打噴嚏 學術界著涼 / 梁麗娟 p. 4-5
- 從D&G禁拍事件看新舊媒介在社會議題中的角色 / 林援森 p. 6-7
- 探討香港中文免費報業的市場 / 莊太量、陳少敏 p. 8-9
- Making TV Accessible / Peter Olaf Looms p. 10-11
- 從台灣傳媒報導總統選舉看中美台的三角關係 / 張家恆、馬梓軒 p. 12-13
- 驀然回首——兩岸三地的文化氣息 / 李嘉盈 p. 14-15
- 從麥田、韓寒論戰談時間使用模式分析 / 秦潔 p. 16-17
- 一月傳媒記事簿 p. 18-19
- 傳媒參考資料 p. 20

[www.rthk.hk/mediadigest](http://www.rthk.hk/mediadigest)

《傳媒透視》網上版提供分類搜索及各期文章閱覽

MEDIA DIGEST online version provides category search and archive of all articles

# 高牆處處——倒退中的香港新聞

十二年前，香港大學高層干預鍾庭耀調查特首民望事敗，校方立即加以調查、公開聆訊應對危機，查個水落石出，也為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樹立標杆。

今天，當年的歷史教訓已經聲沉影寂。港大對「八一八事件」只作低規格、不公開的調查。浸會大學趙心樹教授不待民調完成便公佈初步結果，誤導民意，動機可疑，更惹起師生及輿論猜疑，而校方卻還以既不獨立又不公開的調查，九日內完成報告，不計內容空疏、論據乏力，只求高速平息風波。

再看今天鍾庭耀的處境。港大高層不再干預了，但去年底以來，他有關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一直被中聯辦官員及左派輿論猛烈批評。他打算在特首選舉前推出的民間全民投票計劃，更被指為公投行動。人身攻擊代替理性討論，政治詆譭蓋過學術探討，文革式的無理批判植入本港的公共討論空間。

## 侵擾公共空間的舉動

從浸大調查不力到鍾庭耀飽受攻擊，都看到言論和新聞自由的生態污染和環境屏障。浸大調查小組從未接觸校外人士，自限搜證範圍，便表示證據不足而認定沒有政治干預。浸大的自我設限，形同自我審查，也同時限制新聞界報道真相的能力。校方調查沒盡全力，新聞自由尋求真相的社會職能注定大打折扣。同樣，左派輿論近期對幾位學者大事撻伐，極盡詆毀之能事，不但踐踏理性，抹黑真相，目的更在於宣示他們與中方為敵，以劃清界線，並製造恐懼，令他們行事行文都提心吊膽。據知有傳媒高層告知記者少找該三位學者訪問，避免得罪權貴。這種政治手法假若不幸得逞，社會言論的多元化勢必削弱，也變相收窄新聞自由的空間。

這些侵擾公共空間的舉動，近年接迭發生。例如，港鐵的廣告代理公司以抽廣告為要脅，要求報章不報道對其不利的新聞，（如該公司在海內外鐵路經營的事故、港鐵商場或職員的負面消息），明顯是踐踏新聞自由。相

反，亞視電視的有償報道的片段置入公共時事節目之中，魚目混珠，不僅違規，也偷走了傳媒的公信力，是誠信自殺的行為。

## 扼殺新聞預警作用

新聞自由不斷受到擠壓和攔阻，其實原因多端。除了傳媒或消息來源的自我審查，或者其他組織和力量的不規則介入，更由於特區政府全力控制公共資訊流通，並且給言論自由諸多設限所致。儘管回歸以來，政府新聞處用於公眾和發佈資訊開支上升三成，由特首至各官員亦更注重傳媒報道及輿論，但政府的開放程度以至誠意，卻令人質疑。首先，特首曾蔭權二零零七年連任以來，新聞處籌辦的公開記者會及背景簡報會大幅下降約兩成，由之前每年平均1406次降至以後每年1140次，去年更低至1037次。資源增加而公開交代減少，既反映政府較前不願意推銷政策，或向公眾問責，亦顯示政府寧把資源用於網上官方媒體，以官方單向發佈消息，取代跟傳媒雙向互動的溝通方法。



其實曾蔭權政府到了任期末段，卻絕非無事可為，更非無法按部就班，向公眾交代政策，引發公眾討論。但奇怪的是，政府不時把幾個議題同時推出，令民意數以聚焦，以減輕民意的壓力。例如去年十二月中，政府趁兩電提出加價，同時推出四項爭議不少的政策，包括骨灰龕政策、排檔規管辦法、選民登記新規則、教科書政策檢討。此計分散了市民的注意力，亦令傳媒難以同步跟進五項發展，有利政府控制公眾議題，卻阻礙大家逐項深入探討、發表意見。



其次，隨住警方和消防通訊系統數碼化，一切突發事件的通報權，全掌握在當局手上。據分析，警方向傳媒通報的罪案宗數只佔全部案件不到6%，比起初實施數碼通訊時少了一半，而通報時間平均是事發後32.5分鐘，遠超警方承諾的20分鐘。官方往往以保護受害人私隱為由不通報風化案，甚至連匪徒犯案手法、地點、時間也拒絕公開。例如，新政策實施後，將軍澳連環傷人案，縱使發生於同一地區，卻給警方扣壓，直至一周後才通報，而觀塘非禮女生案件，警方要待受害人數升至四名才公佈。

傳媒無法報道，市民無從提高警覺，新聞的預警作用慘被扼殺於無形。

今年起，消防處亦採用數碼通訊，只會發佈有關火警、特別服務（如洩漏氣體）、集體受傷等消息，卻不公開個別人士的救護召喚。即使涉及高官的個案，政府亦不會通報。無疑，政府沒有使用暴力制止新聞採訪，但通過控制資訊源頭，過濾消息，隱去部分情況或延誤通報，令傳媒無法報道，又何異於卡壓新聞自由，剝奪市民的知情權？這跟限制不同政見者入境或留港工作，從而收窄本地傳媒的採訪資訊源，又有何分別？

其三，保安當局近年多番舉動，卡壓公民活動和採訪空間，不啻是以硬力量強控表達和新聞自由（見《傳媒透視》去年九月拙作）。

零一年年底，政府建議立法規管纏擾行為，以保護市民。立法建議以英國類似法律為

藍本，但該法令九七年在英國實施以來，政府多次用來控告示威人士和組織，以制止抗議活動。若此漏洞不加堵塞，法案又不豁免新聞採訪的刑事責任便匆匆通過的話，和平示威者以至鏗而不捨的記者都會後患無窮，政府可視其為纏擾者而繩之於法，本地言論自由又多一層法律牽制。



## 公共廣播須彰顯民主人權

由廣告壓力到權力干擾，由自我審查到政府控制，都是擋截新聞自由的高牆。公共廣播的意義正是賦權民眾，穿越高牆，讓輿論監督權貴，讓社會凝聚共識，讓民間互相關顧，以民意力量和社會智慧推動一地發展。這種制度理應是文明社會的必備組件，以免傳媒公器淪為執政者、政治勢力和商業利益的附屬。對於民主制度不全、人權不進反退的香港，公共廣播更須彰顯民主人權。

反觀眼下情勢，政府既無藍圖宏願，以建公共廣播，更先增設顧問委員會，再開歷史倒車，以政務官入主香港電台，用不同手段削弱架構協議賦予港台的相對自主權。另一方面，港台以節目改革為由，竟自挖牆腳，換走以捍衛民主人權為己任的吳志森，烽煙節目的新主持回歸歷史，重演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風範，溫文持平有餘，似乎監察和批評力度不足。由此走下去，港台不僅難望成為公共廣播機構，能否保持現時監督權貴的力度和聲音，亦頗成疑問。

如斯亂局下，本港新聞自由的國際排名注定滑落之餘，新聞界亦面臨嚴峻的挑戰。

☞ 杜耀明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 北大人打噴噴嚏 學術界著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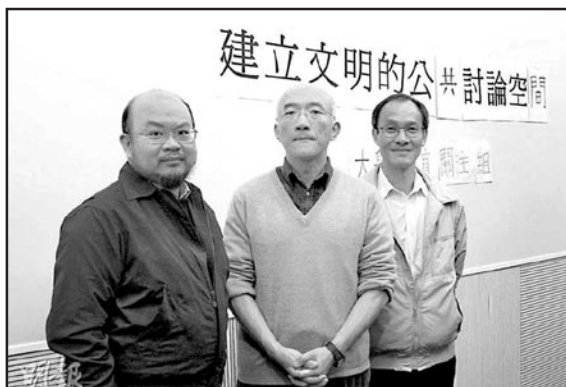
今年我在北京作訪問學者，雖然身不在香港，但透過中大提供的翻牆軟件，仍然基本掌握香港社會的動態，這次數名學者遭左派報紙點名批判，作為學術界的一份子，自然有切膚之痛。

## 困擾香港公共空間的低氣壓

駐香港的代表機構中聯辦對香港學者愈來愈不客氣，這是近幾月來困擾香港公共空間的低氣壓，具體表現在親中報章如何密集的點名批評個別學者或個人。

最先為人注意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成名教授，他給左派報章批評為走極端激進路線，自由去年11月開始，兩個多月內竟有二十多篇文章批評他；成名之後，續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後者在民意調查中發現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創下十二年新低，鍾庭耀立即被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批評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加上親中報章的狠批，文章數目多達七十多篇。其後，《大公報》再以社評點名批評成名、鍾庭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蔡子強是「真政客、假學者」，打着「學術自由」的旗號、披着學者的外衣，長期為個別抗中亂港的政黨服務。

明顯，中央在港官員對不同意見的學者已開始不再客氣了。面對這情況，我會從三方面作出討論，其一是中聯辦在維繫一國兩制中扮演的角色、其次是親中報章在民意的位置，最後是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



## 維繫一國兩制中微妙的平衡

郝鐵川批評鍾庭耀的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到底是否如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所言的純粹學術討論？雖然學術討論不一定要在學術會議中進行，但學術討論上的引經據典或者理論依據必不可少，而且郝部長忽略了其政治身份。在權力上，中央官員與一個大學學者從來都不是對等的，就如老闆要對下屬的工作有此意見，下屬不會理解為平輩的提點，其中牽涉到的，就是尊卑有別的權力關係。所以西方學術界流行是不具名的批評（blind review），就是避免因為被評者與評核者的學術地位或身份，影響評核的客觀性。郝部長衝著鍾庭耀而來的批評，很明顯與調查的政治含義有關。

港人身份調查的代表性輿論已有很多討論，這裡只希望指出，無論新聞自由，抑或學術自由，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其保障除了一國兩制的法律依據，亦在於一些微妙的平衡，就是當權者有多自覺這些自由的可貴，權力擁有者對自我權限有多自覺制約，而一國兩制的維繫，在於北京是否願意自律，不讓一國壓倒兩制。

中國在回歸初期信守承諾，不干預香港內政，主要仍覺得香港矜貴，當然亦與當年二地的經濟及文化的差距有關；但回歸十五年來，中港關係的蜜月期已過，北京對香港的容忍亦逐漸露出疲態，在國內流行的說法，是香港就像一個寵壞了的兒子，香港人從中央得到的好處從來不缺，但又經常自覺比內地人高人一等，所以北大教授罵香港人是狗，在國內不乏支持者，不少人都認為香港人得一想二，而按中國大家庭的老規矩，子孫是要自己爭氣討老人家歡心，但香港既不爭氣又對祖國不懂感激，自然令阿爺覺得不是味兒。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奢求要得到更多的特權，便會出現「憑甚麼？」的問題。因此郝部長對民意計劃的「指點」就不自覺流露京官的威勢，是不願再自我約束的表現，難怪連外國媒體如《華爾街日報》亦嗅到事態的嚴重。



幸而，郝部長的火很快便收斂，可見中央是不會輕易破壞一國兩制的承諾。況且香港的自由空氣對台灣仍有示範的作用，郝部長對學術界的不客氣，亦屬於一種姿態，一方面測試輿論的反應，另一方面亦要看學術界是否識相。

## 親中報章在民意的位置

其次是左派報章在香港輿論的影響力問題。其實左派報章攻擊不同意見作者的事時有發生，回歸前我定期在報章寫評論時，亦曾因為有關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的討論被《文匯報》點名批評。點名批評是少數本地報章的特色，大部份報章對意見的討論是對事不對人，不提姓名卻針對其意見，較為客觀理性；然親中報章的點名方式，卻有恫嚇的效果。當然被點名的人是否覺得受威脅因人而異，我記得當時只是一笑置之，感覺是左派報章亦有其言論自由，也曾經寫過文章分析親中報章的政治處境。英治時期左派報章備受屈辱，對回歸後由港人當家作主寄望甚殷，因此回歸前正是它們爭取輿論主導權時期，點名或攻擊手法有助左報與主流輿論界打筆戰，令社會大眾更留意左派觀點，從而提升親中報章在主流媒體的能見度。

回歸已經差不多十五年，但親中傳媒的地位及對政策的影響力並未因為政權轉移而有所改變，左派報紙所代表的仍然屬於親中人士的觀點，它在言論陣地中有其代表性但卻缺乏帶動民意的力量，而且大部份時間，它與其他主流媒介存在對立的狀態，沒法與主流輿論透過交流及對話作有機的互動。筆者這裡所說的交流對話，是與指和平理性的討論，而非指責與謾罵。因此左派報章近期不尋常的攻擊學者行為，除了緊隨中央路線外，亦可以視為爭取民意的話語權的表現，親中報章若不是用非比尋常的力度，主流媒體基本上不會留意，更遑論納入議題討論範圍。親中報章要提升其政治能量，攻擊反對派自然是策略之一。但公眾如何看待這些攻擊手法？文革式上綱上線的謾罵會否適得其反？令人覺得橫蠻無理？

## 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

最後一提的是學術界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學術研究與大多數社會事務無關，除了少數與社會科學、商業或經濟相關的學科外，香港的學者在兼顧象牙塔內出版、研究及教學要求之餘，只有為數不多的學者關心社會議題；而願意面對傳媒的，更寥寥無幾。無他，社會事務或媒介的參與不會計算在工作表現範圍以內，學者用自己的時間作社會參與，大部份是基於社會良心及對社群的承擔。當然亦有出於其政治信念或者是學以致用的，但溫和的學術界多數用客觀理性的方法對事件作出分析或提出不同的意見，幫助公眾理解事件或作出判斷。即使有學者支持不同政黨，亦代表社會不同界別的不同政見，不明白為何學術界不能有不同的聲音。

中聯辦官員與親中報紙的連串抨擊，令無權無勢的學術界感到焦慮，學術界雖然習慣面對學術上的批評，但面對這種政治打壓卻是有理說不清的，這類攻擊的確會影響到學術自由。很多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會因為怕惹麻煩，會盡量維持「政治正確」而害怕表達自己的觀點；親中傳媒若對學術界虎視眈眈，寫文章或回應動輒得咎，亦會影響學者發表的意慾；即使有學者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亦會顧慮到權貴的好惡，而索性迴避所謂敏感的課題，這些都會損害到香港的學術自由和學者對社會應有的承擔和責任，到最後都是多元意見社會的損失。

學術自由與香港其他的自由是連成一體的，是關乎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問題，過往學術界像一盤散沙一樣，對社會議題欠缺明確的立場，這次面對外來的攻擊，學者的反應不及傳媒的反應強烈，顯然學術界對其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及維持公共空間的任務，是如何溫溫吞吞。

[->] 梁麗娟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

# 從 D & G 禁拍事件看新舊媒介在

DOLCE & GABBANA (D&G)禁拍事件於2012年1月造成軒然大波。事件先見諸於網上留言，批評D&G禁止市民在門外拍照。本港報章《蘋果日報》於1月5日以頭版報道事件，其後持續報道，並引起社會注意。到了1月9日，事件發展至高潮階段，當天數千人在D&G廣東道分店外聚集抗議。從D&G禁拍事件可以看到新舊媒介在社會議題的角色及功能，同時發現舊媒介所發揮的聚焦力及其影響力，始終不容忽視。

新媒介的理解可以簡化至資訊與網絡兩者共生的關係，同時有關新舊媒介諸關鍵詞定義及分析，已見十分豐富且成熟。不少學者就網絡正在改變傳播者及受眾之間的關係，亦提出了不同的見解。Dan Gillmor在《We the media》一書指出，由於互聯網出現，受眾已成為歷史的草稿者，他們目擊事件發生，或者道聽途說所聞，但總可以第一時間把消息經過網絡傳送出來。記者以往是消息首個或主要發放者，但現在已變化，或正在變化著。Dan Gillmor同時指出，受眾在某種層次而言，其所知著可能比新聞記者還要多，因為他們數量無限大，但記者則是有限的。從獨立網站、blog，到社交討論區，從單向、多向或今天蛛網式連結，或多或少說明新媒介的影響力的確正在增加，但本文認為，舊媒介在社會原始事情到成為一個全民注意的社會議題，舊媒介始終是關鍵的平台，因為其聚焦能力仍然十分強大，特別針對社會議題營造方面，其力量不容忽視。

有關社會議題的分期，台灣學者蘇湘琦將其分成三類，分別事件、話題、議題。事件乃指特定時空下所發生的個別現象；話題意指相關事件的累積報道；議題則是具爭議性的多面向話題。但三者之間其實具有一種歷時及因果的關係，如注意力累增程度，一宗原始事件或事情經過大量累積新聞報道，往往可能推動事件成為爭議性話題。學者Cobb和Elder等指出，若成為社會議題，其必須由兩個或以上的團體或涉及利益或權力的參與者所構成，並形成一個衝突過程。

Baker & Anderson等則認為，社會原始事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其經過某些懂得活動運

作的相關人物所發掘和判斷並提出來，然後始為人所知者，這亦是一種造勢的過程。如今這個造勢者則由網絡分擔了傳統記者的功能。但社會議題的發酵，乃至提升至集體關注層次，其往往需要由包括傳統新聞媒介等發放，並令議題聚焦，始能達至全面議題階段。D&G禁拍事件則是一宗可資探討的個案，以了解新舊媒介的分工及其在議題發酵至成熟過程中的角色。

## D&G事件議題分期

就D&G禁拍事件發展論，若以議題分期，D&G事件從1月5日《蘋果日報》報道前為原始事件期，1月5日至1月7日為話題過渡至議題階段，到了1月8日則完全達至議題階段；1月9日後則是事件後設時期。另外，若以事件聚焦點定性分析，1月8日前聚焦點以針對「惡霸」為要，但1月8日後則以「道歉」為主要訴求。

D&G禁拍事件的分水嶺可以《蘋果日報》於1月5日的報道為要。據《蘋果日報》資料顯示最先見諸於2011年12月其間的網上留言，但傳統媒介一直沒有報道。《蘋果日報》記者遂於1月4日在D&G分店門外嘗試拍攝，結果遭干預。《蘋果日報》便於1月5日以頭條方式報道了事件，同時以〈擅禁途人拍照玷污購物天堂 名店惡霸D&G〉作標題。其「名店惡霸D&G」用語已充份反映出其對事件的立論，結果媒介影響力及其效果立竿見影。D&G禁拍事件在社會引起關注的當兒，亦重新回到網上討論區，成為「熱爆」話題。翌日，逾百市民在D&G店前拍攝，以示不滿。

2012年1月5日首見報後，從1月6日至1月8日千人圍店止，除《蘋果日報》外，其他報章亦見報道。按資料顯示，1月6日共10篇，1月7日共4篇，1月8日共13篇，1月9日共18篇。《蘋果日報》從1月6日至1月8日維持約4篇左右，其間亦見不少社會意見領袖先後加入評論。

按Cobb和Elder等所指出，社會議題需要政界或社會「持份者」參與，從D&G事件可見，相關人物在1月6至1月8日其間先後在透過報道或媒介發言。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旅發局主席田北俊、泛民特首初選候選人

# 社會議題中的角色



馮檢基及另一「獨立」競選人唐英年等。事件於1月8日達至高潮階段，新聞見報於1月9日，共達14篇。當天特首參選人唐英年亦作出相關評論，令事件提升至某一種高層次。

2012年1月9日後則是事件後設時期，當中亦發生過兩次圍堵，但人數大幅減少，每次約數百人。事件於1月9日後，若按報量分析見多次起伏，焦點亦有所變化，首先是自稱D&G女店員工在facebook留言狠批「挑機」市民「腦殘」，其後則平等機會委員會一度致函D&G，以跟進事件，另見1月13日及15日分別出現逾百人聚集D&G門外。從參與人量持續減少來理解，事件的關注度正在減少。媒介的報道亦從1月8日（見報1月9日）後持續減少。D&G於1月18日發表道歉聲明。聲明表示：「深切明白到近日在廣東道專門店外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冒犯了香港市民，公司深感歉意，並向大眾衷心致歉（2012-01-18 HKT 02:55 香港電台）。」政府同日亦首見回應。到了1月19日，曾蔭權作為本港最高權力層，並在立法會中作出官方回應，事件似乎可以告一段落。

## 透過傳統媒介發酵

從這宗事件的發展理解，2011年12月網絡出現相關D&G禁拍的留言，本港報章沒有相關針對性的報道。一個月後，氣氛出現180度轉變，其中1月5日《蘋果日報》有關禁拍報道可算是關鍵的分水嶺，亦看到傳統媒介在議題設定的聚焦力之強大。事件由原始事情至議題，必須或始終透過傳統媒介始能發酵。事件的關注點或聚焦點，如上述2012年1月8日前以「惡霸」為要，1月8日後以「道歉」為要，可從示威人士的訴求可資說明。但這「惡霸」和「道歉」，甚至公共空間爭議等曾出現過的主要用詞，均由報章，特別是《蘋果日報》所主導者，其中「惡霸」和「道歉」均為該報分別於1月5日和1月9日的頭條標題用詞。

我們今天經常討論新媒介的影響力如何無遠弗屆，但社會議題的聚焦力始終以舊媒介為要。但傳統媒體作為社會監察者，若以頭條方式針對一家店舖，又是否最理想的新聞處理？

## D&G事件真實和媒介呈現情況

日期	真實(社會)呈現	報章報道	
		新聞文章(篇)	媒介呈現(報章標題)
2011年12月	禁拍事件在網上討論區留言	0	報章未見報道
2012年1月4日	蘋果記者到DOLCE & GABBANA嘗試拍攝	0	報章未見報道
2012年1月5日	網民facebook發起萬人影相活動謝偉俊回應	9	擅禁途人拍照玷污購物天堂名店惡霸D&G(蘋果)
2012年1月6日	逾百市民在DOLCE & GABBANA店前拍攝	18	萬人周日尖嘴聲討DOLCE & GABBANA禁攝風波國際關注(蘋果)
2012年1月7日	facebook專頁逾萬人響應店前拍攝田北俊回應馮檢基到D & G店外抗議	11	禁攝風波DOLCE & GABBANA百人「挑機」起哄(蘋果)
2012年1月8日	數千人店前拍攝唐英年發表對D&G事件的看法	19	店方拒絕道歉維權行動升溫萬人今圍影聲討DOLCE & GABBANA(蘋果)
2012年1月9日	自稱D&G女店員工facebook批「挑機」市民「腦殘」	36	數千人挑機DOLCE & GABBANA道歉吧!(蘋果)
2012年1月10日		23	「D&G女職員」fb鬧港人腦殘(蘋果)
2012年1月11日	平等機會委員會致函DOLCE & GABBANA	16	鬧港人腦殘DG女fb認衰(蘋果)
2012年1月12日		22	平機會插手D&G禁攝風波(蘋果)
2012年1月13日	百人聚集D&G門外	8	影爆D&G續集今演優先場(太陽)
2012年1月14日		14	怒氣難消第二波圍拍D&G(蘋果)
2012年1月15日	百人聚集D&G門外紫荊俠出現	8	聲討D&G霸權萬人今再挑機(蘋果)
2012年1月16日		10	紫荊俠出動維護正義(蘋果)
2012年1月17日		10	D&G禁攝涉刑事重案組徹查(蘋果)
2012年1月18日	D&G道歉	7	D&G今晨發聲明向港人道歉(東方)
2012年1月19日		18	D&G遲道歉市民拒收貨(蘋果)
2012年1月20日		7	論D&G事件不希望分化兩地人民(大公報)
2012年1月21日		4	市民續影衰「癲 & 豬」(東方)
2012年1月22日		4	續圍D&G(東方)

林援森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 探討香港中文免費報業的市場

壹傳媒旗下的《爽報》自2011年9月19日加入免費報紙行列以來飽受各方抨擊，無論它的新聞價值如何，本文有興趣探討的是它為同行尤其是中文報紙，以及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現時本港周一至周五出版的免費中文報紙已由2005年的3份增至今年的5份，令免費報章的每日總發行量上升至300萬份。而免費報紙的大戰也被形容為由「三國鼎立」時代走至現今的「春秋五霸」。究竟市民能不能消化多份免費報紙？收費報章應如何找到生存空間？報業能否是一場共贏遊戲？廣告是否會隨報章數目增加而增加呢？

有關5份中文免費報紙的資料列表如下：

報紙名稱	開始日期 <sup>1</sup>	現時平均每 日發行量 <sup>2</sup>	所屬集團
都市日報	15/4/2002	363 784	瑞典集團 專辦免費 報紙
頭條日報	11/7/2005	855 627	星島日報
am 730	30/7/2005	400 730	
晴報	27/7/2011	503 000	經濟日報
爽報	19/9/2011	902 385	壹傳媒

就以上資料顯示，現時5份免費中文報紙中以《爽報》發行量為最多，其次是《頭條日報》、《晴報》、《am730》及《都市日報》。但若參考較早前調查結果，則以《頭條日報》每日發行80萬份居首、而其平均印刷頁數93頁也為最多，而《am730》及《都市日報》則並排，每日各也發行40萬份。發行免費報紙的成本不菲，除了紙費，還有派報員的工資、編採



人員的酬勞、燈油火蠟等，究竟香港能否可容納5份免費中文報紙？《爽報》又是怎樣後來居上超越《頭條日報》及它的特色何在？

## 報刊廣告有增長空間

免費報章的構思及運作其實跟互聯網站一樣，都是供應免費資訊及娛樂給市民，從而賺取廣告收入。香港可有5份免費中文報紙之多，是因為此市場有利可圖，這可從《都市日報》及《am730》分別於創刊後14個月及22個月達至收支平衡及星島日報集團於上年度廣告盈餘達二億四千萬可見。由於廣告收入很大程度上跟經濟周期有關，免費報章近年賺錢，原因是香港經濟好轉。收費報章由於有固定的收入，受經濟周期的影響較小。

免費報章的廣告，大多都是資料性重的平面廣告，例如教育機構、銀行財務、電腦電子產品、零售業、美容化粧及成藥、旅遊運輸、及電訊服務等。這些廣告的資訊不能在三十秒的電子傳媒廣告中表達，所以免費報章和電子傳媒沒有直接的競爭。如果市民養成每天閱報的習慣，報章廣告的效力可能比電子傳媒的還要高，所以報刊的廣告收入是有增長空間的。

現時免費報章內容跟廣告的頁數比例約4比6。一份免費報章，就算它每天有100頁廣告也不會印100多頁，否則它只是傳單而不是報紙，市民只會覺得不便。免費報章的市場只可橫向發展，即可以存在多份少頁數的報紙，而不會存有一份厚厚的獨市報紙。

既然在自由市場中前3份免費中文報章有可觀利潤，便自然吸入新投資者加入分一杯羹。但要在眾多免費報紙突圍而出，確需花一些心思。就新聞內容而言，各間免費報館所提供資料相若，可說是替代品。因此為避免被取代，各報館均需為自己定位。以《頭條日報》而言，它因有強大後盾《星島日報》支持，所以它能以內容豐富、多角度捕捉新聞及深入分析見稱，而早成為中文免費報紙的一哥。至於《am730》則是以中肯報道手法，潮流新聞題材，新穎版面設計及專欄吸引固定讀者群追



看。而《晴報》所走的路線，則以香港本地新聞及娛樂新聞為主打及走大眾化方向。較新的《爽報》定位，則在於其多媒體如視頻及音頻表達方法，務求以另類表達方式吸引一批新的讀者群。

## 成功因素及帶來的衝擊

免費報章成功與否，有幾項重要的因素，而最大因素就是派發的網絡。除了特色與別不同外，《爽報》派發方法也作了一新突破。一般而言，派發免費報紙覆蓋點愈廣，可接觸讀者群便愈多，在地鐵派發，可全天候運作，而且讀者都是上班一族，量及質都有保證。如報章的分發受天氣的影響，而且讀者群不明確，廣告商很難知道信息可否傳到目標消費者中。所以除了《都市日報》可獨享於港鐵站取閱外，其他免費報紙均以早上時段於港鐵站沿線外、商廈、屋苑、巴士及小巴士派發，期望讀者於早上乘搭交通工具時間閱讀。但《爽報》則試圖突出此規限，除派發時間地點保留外，更增設傍晚時段，期望以不同時間接觸不同讀者群。事實上，這等改變確實為《爽報》開出一條新方向。



那麼《爽報》為同行帶來甚麼衝擊？因免費報紙賴以為生之道不是在於其收費，而是在於其廣告效益。而廣告效益又與發行量掛鉤，所以當一間報館的發行量佔大部份時，不同廣告商投放在該報館廣告便相應增加，而相對其他報館不管是免費或收費報紙便相應減少，換句話說，是影響其他報館的收入。

以往香港有3份免費中文報章時，廣告商的投資縱然在過往數年有明顯上升，但相信隨著5份免費中文報章湧現時，此部份投資不會無止境擴大，相反廣告商更會審慎投放資源。因此，長遠來說，必須有固定讀者群及發行

量，才是免費中文報章生存之道。

此外，免費報紙之間除可成為對方的替代品外，部份走大眾化路線的免費報紙更是同類收費報紙的替代品，故《爽報》的出現便即時影響部份收費報紙銷路，而當中尤以《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太陽報》最為明顯，而《東方日報》及《太陽報》更分別以減價一至二圓作應對。從中可見《爽報》為同行帶來的影響。不過這影響只局限於部份報紙，相對於一些精英報(綜合及財經)影響較少，這可與精英報的缺乏彈性需求有關，因精英報的需求較固定及沒有替代品，故所受影響較微。

縱觀以上所言，《爽報》的出現確實為同行免費報紙及收費報紙帶來不少衝擊，有些是帶來新思維，有些則是減少了對方的利益。

不過於總結時，本文更想帶出免費報紙對整體社會的影響。無疑，免費報紙的出現，增加了港人閱報及相關的時間，而回收免費報紙也為一些長者帶來額外的收入，可是對於每日耗紙量300萬份的免費報紙，它所帶來的負面界外效應也不容忽視。

早前香港環保組織「環保觸覺」一項調查顯示，以目前香港5份免費中文報紙每日發行量300萬份統計，單就每星期消耗紙張便超過2000噸，相當於砍伐3.7萬棵樹，面積等同於3個半維多利亞公園。

對於免費報紙的報館及普羅市民，是否印發最多發行量及拿取最多免費報紙為之最大得益？對整體社會來看，社會損失又由誰來承擔？免費報紙能為港人帶來免費訊息時又能兼顧社會責任嗎？香港的報業可以是既賺錢又有良心的事業嗎？香港市民能於滿足個人渴望時又同時盡好公民責任嗎？

【+】 莊太量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 陳少敏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學生

1. 資料來自自各大免費報紙的網址  
2. 根據爽報於26/11/2011引用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HKABC)最新銷數審核報告(2011年11月)

# Making TV Accessible

In 2011, the world's population passed 7 billion mark. It was also the year when the number of mobile phone subscriptions exceeded 3.5 billion and China became the dominant market for smart phones. With so much attention being given to mobile phones and computer tablets, there is a tendency to overlook media such as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the role that they still play. 1.4 billion household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 TV, representing 98 per cent of househol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nearly 73 per cent of househol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time we spend on media, television still accounts for the lion's share of media "consumption".

What we often forget is tha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mobile phone and television are moving rapidly from analogue to digital. For television, the transition from analogue to digital transmission began in 1997. By the end of 2011, USA, Japan and much of Europe had switched on digital television (terrestrial, satellite or cable) and switched off analogue TV transmissi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be starting digital transmission and turning off analogue in the course of the current decade.

In urban areas with good broadband penetration, hybrid television solutions using digital broadcast and the Internet known variously as Connected TV, Smart TV, Catch-up TV and HbbTV seem likely to become mainstream in coming years. IPTV has matured rapidly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century and is now one of the main digital media platforms in city states. It is conceivable that IPTV will make substantial inroads into the digital broadcast television in affluent urban areas, but is unlikely elsewhere.

## **The challenge**

Many of the readers of this article may wonder what the fuss is about. Everybody can watch TV, can they not? To enjoy access to TV, all you need is the money for a TV receiver, electricity and a television signal.

The problem is that,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ithout money for a receiver and who live in a home without electricity. Even if these basics are in place, as many as 1 person in 6, even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cannot enjoy access to TV. Exclusion may also be due to one or more factors, including physical or cognitive disabilities and age-related issues (small children unable to read subtitles, retired people not being able to follow the

dialogue). Being prevented from watching TV may also be the result of cultural or social exclusion (migrant workers within a country or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unable to follow programmes in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or region).

At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 agreement was reached by world leaders on a set of 9 targets to be reached by 2015, one of which is "to ensure that all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have access to television and radio services". Given that more than 1.2 billion people need to be helped, is it realistic to reach this target by the deadline, given the current economic target and the many demands being made of government spending? This is the challenge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 **The main accessibility options**

There are four main factors that have an impact on television accessibility:

1. Usability - The intrinsic accessibility of TV programmes themselves. Here the focus is on human factors and usability issues of television pictures, sound, setting-up and re-tuning, discovering, using and enjoying TV programs;
2. The viewing context - The extrinsic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accessibility. This covers the use of devices such as remote controls; interfaces between TV receivers and assis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hearing aids so that viewer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can hear the TV sound directly in their hearing aids;
3. Access services accompanying TV programs and other on-screen solutions. We have all seen TV programmes with subtitles. Many will be familiar with some of the other options including sign language (for persons who are deaf and do not communicate with an oral language), audio description (an additional audio track describing key visual cues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or have cognitive impairments) and even spoken subtitles for those who have difficulties reading subtitles for programmes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4. Accessibility through special receiver functionality such as the use of Text To Speech (TTS) technology to provide spoken EPGs.

The first reaction from a typical decision-maker in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no clear



business case for making television accessibility. Accessibility is a worthy cause, but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t a time when television is under economic pressure on a number of fronts.

If we look at the first of the 4 factors, improving the usability of the programmes, action can be taken in a matter of days and need not be particularly expensive. During the Football World Cup in South Africa in July, 2010, Vuvuleza trumpets wreaked havoc on the first day, making television commentators almost unintelligible. But by the second day, audio engineers had worked miracles and found solutions. The same goes for the legibility of on-screen captions and titles in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programmes. Discussing the basics of TV picture and sound accessibility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editorial teams can raise awareness about fine-tuning broadcasting so that as many viewers as possible can benefit.

The second factor – selecting a well-designed remote control, making sure that viewers have the right glasses, ensuring that their TV screen is clean and thus making the best of the receivers and devices viewers already have - can also have a big impact.

The third factor is perhaps the most contentious – offering access services like optional same-language subtitles, audio description or spoken subtitles -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to a number of viewers with disabilities or age-related issues. It is certainly the case that providing audio description and visual signing all cost money. But for the main TV channels even in small countries, doing at least two of them rarely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on budget of more than 1%.

Those working on television accessibility are not just state or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 either. In the UK market, the Sky pay-TV operator and its main channels meet the targets for subtitling and substantially exceed targets for audio description. The Sky+ personal video recorder (PVR) was also one of the first to be able to record all of these access services so that they could also be used when viewing recorded programmes.

As far as the 4th factor is concerned, developments like Text To Speech, so that the viewer can have menus and programme guides read aloud, are already on the market or will be merging in the next year or so. Research laboratories

at NHK in Japan and in Europe have pioneered solutions to ensure that elderly viewers have better control over the intelligibility and delivery speed of TV programmes. Technologists at Dolby, broadcasters in the UK and Sweden and researchers in Germany and Japan have all come up with “clean” or “clear” sound solutions to maintain multiple audio channels all the way to the viewer so that he can adjust the sound to meet his personal requirements. As we saw with TTS in car navigation systems, when a solution like speech synthesis finds a market,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benefits of scale lead to falling component costs. This allows TTS solutions to move into mainstream equipment.

### ***Making change happen***

The main barriers to making TV accessible are neither economic nor technical. They are human – our ow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challenge is, what the options are, and how to find the money and staff to make TV accessible. Providing some useful examples of good practice that can be emulated by others will be crucial to success.

Is it realistic to reach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 target by 2015? As far as TV is concerned, the answer is a qualified “Yes”. The target may not be reached 100% in all countries by the deadline, but with the right mixture of carrots and sticks (adjustments to national legislation, consensus on access service targets reached by the TV industry and regulators and some tweaking of TV standards to remove some of the ambiguity of the optional provisions), a great deal can be done if all the key stakeholders endorse the target. Ultimately, success depends on “doing more with less” – making an honest case for TV accessibility that makes economic sense, setting realistic targets and having the necessary 360° expertise to make change happen.

### **☞ Peter Olaf Looms\***

*\* Peter Olaf Looms has worked i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nd is currently chairman of the ITU-T Focus Group on Audiovisual Media Accessibility (FG AVA). FG AVA aims to complete a Roadmap of accessibility actions (legislation, regulation and standardisation) before the end of 2012. Details can be found on the ITU website in Geneva ([www.itu.int/](http://www.itu.int/))*



# 從台灣傳媒報導總統選舉看中美

普選，這個議題對台灣居民而言並不陌生，但卻是大部份港人所渴望得到的。適逢我們就讀新聞及傳播學系，亦碰巧今年是台灣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讓我們有機會在老師帶領下，採訪選舉過程，並親身了解民主是如何實踐。這次能到台灣採訪總統選舉，是一個相當寶貴的經驗。在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訴求不知何時實現。台灣的經驗，對我們來說確實有一種新鮮感。

這個台灣大選採訪計劃是於去年十月初確立，並一早預訂了機票及房間。教授們每星期和我們進行各式各樣的訓練，由最基本的選情資料、拍攝和錄影技巧，以至台灣民主化的窺探，皆是反反覆覆的磨練和修正。這些磨練最終確立了一種超越一般新聞報導的視野，用更深層次及更超然的取向來探討台灣的政治。這篇分析文章便是此取向的實踐。

在台時，我們有幸能訪問淡江大學副教授李大中及南亞技術學院助理教授唐明輝，探討中、美、台三者之關係。他們的見解令我們的眼光不再集中在台灣，而是看得更遠，從全球政治的層面了解台灣何去何從。

## 台灣四大報立場鮮明但乏遠見

雖然馬英九奉行的「三不政策」在過去四年獲得兩岸局面穩定的成果，但中、美、台之間的微妙關係仍是亞太地區的重要議題。表面看來，今屆台灣總統大選較以往「冷清」，欠缺台海軍事緊張作配襯，大陸政府反應亦比以往的「文攻武嚇」來得溫和，而美國亦放棄在台灣大選期間，派遣第七艦隊巡航台海的挑釁行為。今回馬英九成功連任，台灣傳媒普遍認為兩岸關係定必走向務實和平。但實際上台灣未來的安全，卻與今後大陸與美國之間的拉拉扯扯關係密不可分，並非如此般理所當然走向台灣自決式平穩。

在台灣總統大選有了結果後，台灣四大報章對上述議題之報導，均趨向淡化大陸與美國對台的拉拉扯扯關係。在選舉翌日（一月十五日），台灣四大報章對大選之報導幾乎佔據所有新聞版面，大篇幅報導選舉結果、各陣營反

應、選舉回顧等，但對選後台灣於兩岸關係或美、中、台三角關係中之變化的報導則相對平淡。以台灣《蘋果日報》為例，其於A20版以「馬任內不太可能訪中 兩岸政策延續『先經後政』」為題，用全版篇幅報導，並以「馬勝選『中美如釋重負』」為題，於版面下方設報導，內容主要引述外國傳媒及學者之言論，道出兩岸經貿在馬連任後會更為強化，區域緊張機率亦會因此而降低。

此外，立場傾藍的《聯合報》頭條開宗明義：「總統大選 689萬：609萬 馬英九贏了92共識贏了」，並在A5版以「觀察站」欄目撰寫題為「政經互動穩定 兩岸現有框架 符合美利益」之評論。文章提及：「蔡英文不確定的態度，等於兩岸關係的未爆彈，也喚醒美國對陳水扁執政八年充滿不確定性的恐懼。陳水扁執政八年，讓台灣從民主奇蹟，變成麻煩製造者，台灣海峽成為比朝鮮半島還不穩定的熱區。」文中並指出，蔡英文若當選將會帶來危機，藉此暗示馬英九當選，他的施政會帶來兩岸穩定。

另一泛藍報章《中國時報》在A22版，以一版報導外國及中國大陸傳媒及學者，以及美國政府及美國政策研究專家的意見，以「兩岸和平」、「維持現狀」等作基調報導，同樣表達了台灣自決性的安定訴求。

至於泛綠傾向的《自由時報》，則在A12版以半版篇幅集中報導大選後的兩岸與台美關係，引述外媒看法指馬英九勝選「北京滿意華府放心」，附以「馬政府和中國談判籌碼愈來愈少」為題之特稿，解釋台灣的兩岸政策和對美外交將持續走傾向大陸的路線。

大選翌日《聯合報》的社論認為，馬英九連任「可視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獲得『民主程序』的背書」，並認為是次大選決定勝敗的因素是「政策輸贏在兩岸」。我們分析台灣報章的報導，發現有關大報是傾向維持自決現狀與追求安定，但卻忽略民主選舉背後的複雜全球關係，是影響台灣人自決前途的關鍵所在。



## 新聞媒體欠缺監察和示警功能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始於80年代中，其本土身份認同亦因此而遞增。陳水扁執政時，其透過落實新的憲法和公民投票去推動台灣的民主化。同時，亦撤銷國家統一委員會以及推行國家統一綱領。這些舉動，都促使台灣居民產生本土身份認同以及對台獨的訴求<sup>1</sup>。

儘管實踐民主化增加了台民的自決空間，但中、美、台的三角關係仍非其可決定。美國對兩岸問題，其目的就是一方面保護它在台灣及亞洲的利益，另一方面以民主自由為藉口反對大陸以武力侵台。

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及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指，現時馬英九政府與大陸似有默契，而美國奧巴馬政府在兩岸關係中最終目的是從利益出發，維持現狀會令美國從中獲得最大利益，所以在今次選舉前，奧巴馬政府在經濟及區內政治外交上，也要中國的協助。

台灣南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唐明輝則表示，中、美之間的關係暫時不會被破壞，除因兩岸關係能保持和平及穩定外，中國崛起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近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美國需要中國協助。此外，美國在北韓棄核等國際重大問題上，需尋求北京配合。台灣方面，亦會乘著中國經濟起飛之勢，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由此可見，中、美、台的關係於近年會相對穩定，而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亦將逐步提升，但並非沒有暗湧。唐明輝認為，美國仍然會暗中防範中國，而美國仍會在日本、新加坡等地部署軍力，不會輕易放下腳步。

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前宣佈，調整新一年的軍事策略，並會將軍力投放在亞太地區。唐明輝認為，美國是非常緊張中國海軍的力量增強，所以美國近年，不管是奧巴馬，甚至在小布殊年代時就已經開始有一些部署，美國的軍事力量從過往的中東轉移到亞洲來，尤其是亞太、西太平洋。連日本的軍費也日漸增加，目的也是要牽制中國，可看出美國的目光是重新放到亞太地區，以圍堵中國大陸，牽制中國崛起。

李大中認為在種種不穩定因素下，台灣居民的自決影響力相對較弱，故「台灣人認為兩岸和平理所當然，其實未必。」傳媒在這不穩定環境中的角色，應當比現時有所調整。李認為「有甚麼樣的社會就有甚麼樣的媒體，媒體是社會的反映」，他批評台灣傳媒「媚俗化」，國民亦要自我檢討。台灣媒體強調新聞的「接近性」，對新聞的「影響性」置於較次要位置，未有努力發掘背後故事及意義，或未有充份利用新聞自由。在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的飛彈，「示警」功能尤顯重要，但傳媒偏重讀者「想知道的」，而非他們「需要知道的」。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明言：「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美問題。」這句話道出了現時的台灣是客不是主、是「閒」不是「莊」的身份。美國學者 Kennedy (2007) 則隱晦道出一觀點：對美國最抽象的利益而言，維持台灣現狀是相當於獨立<sup>2</sup>。

這一趟美國第七艦隊沒有在台灣大選期間遊弋台灣海峽，這是因為近期中美關係良好。倘若美國撤走第七艦隊，中國對台動武，台灣能抵擋嗎？若中國大陸不對台動武，但卻施予台海經濟封鎖或禁運，台灣能生存一個、兩個月、三個月？看來，美國第七艦隊政治或中美關係的轉折，才是台灣前途的重要變數。有言，新聞媒體必須發揮監察 (monitor) 及示警 (observe) 功能，我們所分析的幾份台灣大報，看來是略為欠缺發揮「監察」和「示警」功能。

近期美國戮力拉攏菲律賓及越南等國家，若美國真的要圍堵中國，還需要台灣嗎？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能影響中美角力嗎？這一切，台灣的新聞媒體若是仍然以「局內人」的身份來理解及報導，其視野必然是有限。

若媒體的視野決定了大眾的視野，台灣的一般民衆有終極民主化的視野外，能夠掌握「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美問題」的視野和理解嗎？

【➡】張家恆、馬梓軒

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三年級學生

1. Gang, Lin (2007), U.S Strategies in Maintaining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sues & Studies 43(2), 224-225

2. Kennedy, Andrew Bingham (2007), China's Perceptions of U.S. Intentions toward Taiwan: How Hostile a Hegemon? Asian Survey, 47(2), 268-287

# 驀然回首——兩岸三地的文化氣息

一年前，我與十四位本地文化精英，踏上香港大學和UK Clore 領袖培訓計劃合辦的「文化領航學程」；一年內，我們接受來自歐、美、香港、以至新加坡等地的藝術總監、行政總裁和頂尖的藝術行政人才的指導，並遠赴台灣和中國考察；一年後，我懷著充滿盼望和熱熾的心，面對著香港的文化將來。

## 台灣獨特的文化色彩

最近從新聞得知，曾於1999年接掌台北市文化局長的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快將出任文建會主委，成為台灣首任文化部部长。這則消息令我不期然回想起去年夏天，我與班中幾位同學有幸跟隨當時仍在香港擔任訪問學人的龍應台到台灣考察，先到台北參觀了當地各重要的文化機構和場地，然後再到台東匯合其他人，視察當地如何保護和發展原居民的傳統文化。雖然是走馬看花，但也能察覺到台灣的文化，無論是藝術水平、教育理念、場地管理和文化遺產的保護，都很成熟。

在一個下著微微細雨的下午，我們一行六人前往老泉山，參觀道藝合一的「優人神鼓」。1988年，劉若瑀繼承波蘭劇場大師果托夫斯基在山林中訓練的方法，及注重去表演者的內外修練的理念，遠離台北市的繁囂，在僻靜的老泉山創立「優人神鼓」；五年後，得到



黃誌群擔任擊鼓指導，加入中國傳統文化，如太極、靜坐和武術元素，奠定了劇團的訓練和表演形式，並製作了多部藝術水平極高的作品，包括《聽海之心》、《金剛心》和《禪武不二》，透過簡潔的舞台，震動人心的鼓聲，傳達「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富禪意的境界。他們之所以能夠到達藝術的高水平，除了因為有貫通中西的知識、敏銳的觸覺和刻苦的訓練外，更重要是他們懷著對藝術追求的純粹心靈。我與工作人員和表演者交談的時候，都被他們質樸

的言行、寧靜的心境和清澈的眼神觸動。然後，聽到他們背著大鼓，在破曉時份，步行到山上劇場訓練，日復如是；這種恆心和毅力，更令人敬佩萬分。

下山後，我們探訪台灣另一位大師林懷民的「雲門舞集」舞蹈教室。這，是非一般的教育中心；沒有考試、沒有分數、沒有比賽，只



有一張張快樂的笑臉和不知不覺間的蛻變。結合超過三十五年的舞蹈經驗，林懷民創出「生活律動」教學系統，引導兒童創造屬於自己的動作，每堂課「以靜坐開始，以擁抱結束」，其間沒有特定的課程，卻是靈活多變、因材施教，目的是建立兒童的自信，並學習欣賞別人，培養樂意分享的性格。教室以綠色和白色為主，牆上畫有由小蝌蚪逐漸成長為青蛙的過程。每間課室都設有一扇只可由外望向內的窗，讓家長們了解學習的過程；而最後一堂課，更邀請父母參與其中，與小朋友一起感受舞動的樂趣。

台北的多個表演場地中，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松壽路的「新舞臺」。雖然沒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宏偉或是華山1914文創園區的活潑，但它卻有一種親和力。這是因為「新舞臺」的管理和服務都十分細緻體貼，例如有毛氈提供予寒冷的觀眾，也有供兒童使用的軟墊，讓坐椅能加高一點，另外，還設有透明的特別室，讓有少許身體不適的人可坐在其中，繼續欣賞演出。後台的化妝室寬敞明亮、設備齊全，有電視機轉播前台的情況，而且還可以根據藝團的需要而改變所有擺設。「新舞臺」引入了酒店管理的理念，讓表演者和觀眾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台東的原居民擁有獨特的文化色彩，而這些特色並沒有因為城市發展而被淹沒。我們沿著太平洋的海岸線，乘車前往比西里岸，欣賞



寶抱鼓樂團 (Paw Paw Drum) 的演出。比西里岸文化中心是根據阿美族的傳統建築而興建，除了是寶抱鼓樂團的表演場地，也是白守蓮部落的集會中心。中心內有不少部落特色的擺設和食物，而且還有族人親切的慰問。寶抱鼓樂團的一班年青男女，身穿部落服飾，將打漁的浮球改良成新式的非洲鼓，用最純真的歌聲和熱熾的舞蹈，表達愛和希望。當我們離去的時候，這班年青人還追著車子，一邊揮手，一邊歡送我們。對於他們來說，快樂來得很簡單。

## 上海市政府的支持

懷著快樂的心情，我們又再次踏上旅途，而目的地是上海。十月的上海，微微細雨，加上路旁的法式梧桐樹，濃厚的文化氣息，感覺份外迷人。在台北有不少的文創園區，而上海則有紅坊和八號橋。

2005年初，在上海市政府的帶領下，建設了一個城市雕塑藝術中心——紅坊。紅坊是改造



廢棄的廠房，建成一個獨特的藝術空間，內設有展覽廳、雕塑廣場、創意商務區和休閒區域等。在紅坊內還有楊明浩創立的設計工作室和知名服裝設計師吉承的設計工作室等。同時，紅坊曾舉行過不少大型的時尚活動，如新車發佈會。在這個遼闊的區域內，不時還會見到具特色的雕塑。紅坊結合了商業和藝術的元素，亦把本來被廢棄的廠房，重新加工整理，成為一個具活力的雕塑藝術中心。其實，在國際上，早已有「歷史建築再利用」的觀念，也有相當成熟的法律來規範歷史建築的開發；如在法國，便有專門的「歷史建築再利用」的建築師執照，而巴黎的左岸貝西區便是其中一個城市再生的項目。

離開紅坊後，我們一行人乘車前往位於建國中路的8號橋。8號橋的命名別具心思；每座

建築物都有天橋相連，也喻意是連接國內和國外、文化溝通的橋樑。園區以便宜的價錢租出用地予不同的機構和藝術家們，而且還會按著用戶的需要而靈活地作出調整。8號橋既保留了舊廠房的磚牆和縱橫的管道，另外，還有新的建設，如室內的小花園，作為休憩的空間。在8號橋內，舉辦過不少大型的活動，如悉尼皇家「澳」妙嘉年華、上海黃埔國際現代舞季開幕典禮，甚至有香港時尚品牌春夏時裝發佈會。租戶中，更有著名電影導演吳思遠的影視工作室。

在上海，我們還參觀過不少獨特的表演場地。其中一座是特別為表演音樂劇而興建的上海文化廣場。偌大的舞台分成三層：基本舞台下，設有冰台和水台，供不同形式的表演之用。而且，前台和後台皆是相等的面積，以方便場景的替換。後台的貴賓化妝室，更有如酒店的尊貴套房，內設有桑拿室和按摩池。另外，還有多個供不同表演藝術形式之用的排練室。上海給予我的印象是，只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他們便能在短時間內重建和興建文化的硬件。

## 香港文化發展的期盼

香港的西九龍文化區在農曆新年期間，舉行了西九大戲棚。一連幾日，戲棚內上演了多套熱鬧的粵劇，另外還由M+策劃了多個與粵劇有關的現代藝術展覽。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亦推出了發展的藍圖，由戲曲中心開始，各表演場地均會陸續被興建。西九龍文化區是香港文化發展的里程碑，也是我們更邁向國際化的重要階梯。

台灣和上海之旅，燃點起我對香港文化發展的期盼。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匯合的地方，擁有獨特的本土文化和國際的觸覺，而且人才鼎盛。隨著西九龍文化區的發展，政府對文化的重視，各藝團和藝術家們的努力，我們定能在互信的基礎上，攜手邁步向前！

【+】 李嘉盈  
香港電台第四台節目編導

# 從麥田、韓寒論戰談時間使用

近期知名博主麥田與韓寒的論戰成為互聯網上熱議的話題之一。事件起因是麥田發表了一篇題為《人造韓寒》的文章，質疑韓寒背後有團隊在塑造其「公共知識份子」形象。而麥田的這篇文章因為列舉了大量資料，被網友稱之為「技術貼」。其中一個重要的技術細節是麥田給出了一個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因為如果公民韓寒不是團隊運作的『雙簧』，那麼你不可能一邊進行著非常專業的賽車比賽，一邊還好整以暇的寫時政博客。也就是說，不太可能存在賽車時間，還有心情和精力發表時政博客的情況。」他細數從2008年到2011年之間韓寒參加賽車比賽的時間與發表博文的時間，發現有13篇文章是韓寒在參加賽車比賽的期間發表的（見下表）。言外之意，韓寒背後有團隊有寫手。

雖然，在重重質疑聲中，麥田最終向韓寒道歉。但是，他的這個技術細節卻為我們引出了一個有趣的話題：時間使用模式分析（Analysis of Time Use Pattern）。

麥田製作的韓寒賽車和博客時間比對表

賽車比賽時間	比賽	博客發表時間	博客標題	字數
5.30-6.1	2008 CRC	6.1凌晨1點	《她在錯誤的時間。。(莎朗斯通)》	2000
9.5-9.7	2008 CRC	9.5	《北京長期單雙號限行之後》	5000
12.12-12.24	2008 CRC	12.14	《鄭繼超影視基地》	轉貼
4.19-4.20	2008 CTCC	4月20日	《一場民族主義的趕集》	1800
6.12-6.14	2009 CRC	6.11	《綠壩系統提醒你》	1200
5.23-5.24	2009 CTCC	5月23日凌晨3點	《郝會龍同志和陳亞平同志被狗咬了》	1400
3.13-3.15	2010 CRC	3.14	《我去哪裡找，像你這麼好》	1800
5.14-5.16	2010 CRC	5.14	《那些洗不乾淨的蔥們》	1300
9.17-9.19	2010 CRC	9.19	《遊行的意義》	1400
9.11-12	2010 CTCC	9.13凌晨4點	《保住非法字元》	1300
7.1-3	2011 CRC	6.30日	《沒希望工程》	2300
11.4-6	2011 CRC	11.4	《序言一篇》	700
5.28-5.20	2011 CTCC	5.28	《遊戲指南》	1000

## 時間使用調查的作用

所謂時間使用（Time Use），簡言之，就是你在一段時間內（一天、一周等等）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大家可能對於大規模的時間使用統計更為熟悉，常見的例子是某個國家或地區對全民的時間分配情況展開調查，即通過量化的手段（如入戶訪問、電話採訪等），追蹤你的時間使用行為。

時間使用統計的產生與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r）有著根本的聯繫。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13年的一項關於體力勞動者業餘時間分配的研究，並且在二、三十年代的前蘇聯大行其道，近年來已經有上百個國家或地區進行了這項統計，而且許多進行此類調查的研究機構和學術網路也應運而生。

那麼，進行此類研究的意義何在？紐西蘭對本國開展的時間使用調查有如下描述（Statistics New Zealand, 2007, p.1），我們可以從中窺見一斑：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資料可以顯示出不同的情境、職責如何影響人們選擇某一時段的活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資料提供了經濟統計無法測量的生產活動（因為這些活動都是在市場以外發生的）；從健康的角度來看，它可以測量人們對於某項活動的曝光率以及環境對健康的影響。

時間使用調查還有助於研究以下問題：不同社會群體的生活；志願部門與家庭對社會的貢獻；有薪工作與無薪工作之間的關係；以及日後人們持續進行無薪工作的能力。」

《紐約時報》曾經將2008年美國時間使用調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的結果進行了形象的視覺化，從中可以得到許多資訊，例如2008年全美平均日工作時間是7.6小時，男性比女性日工作長0.9小時，女性平均每天花2.6小時做家務等。然而，這些調查經常出現一些問題，例如受訪者高估自己的工作時間、低估自己的娛樂時間等。正是因為通過入戶訪問、電話訪問等手段得到的資料是受訪者

# 模式分析

的自我報告。有什麼方法可避免這些問題呢？

在這裡，麥田在攻擊韓寒的過程中又為我們做了很好的展示。麥田通過網路資料採擷（Internet Data Mining）的方式，得到了兩列資料：一列是韓寒參加的賽車比賽時間，一列是韓寒發表博客的時間。麥田認為韓寒在賽車比賽期間，不應該有時間關注市政新聞，更不應該廢寢忘食的在凌晨發博客。話句話說，他認為韓寒在同一個時間點做了兩件本不可能同時進行的事情，進而質疑有人在背後替韓寒做這些事情。網路資料採擷使用的是伺服器上的日誌（Log Data），是有機器客觀記錄下來的行為資料，例如何時登錄、何時發帖等等，因而避免了自我報告可能出現的問題。

## 在傳媒研究領域的意義

雖然麥田的分析距離學術意義上的統計差距很大，但是從網友發出的「超強技術貼」的驚歎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些許帶有科學意味的統計分析所迸發出的力量。那麼，在傳媒研究領域，這類分析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用戶的時間分配習慣對於傳媒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時間分配習慣就如同消費習慣，只是媒介使用者付出的不是金錢，而是時間。消費習慣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有直接影響，同樣的，媒介使用著的時間分配習慣也蘊含著商業價值。

例如，對於廣告商來說，什麼時間投放廣告，傳播效果會最好呢？所謂「黃金時段」（Prime Time），正是觀眾集中收看或收聽節目的時間段，自然也是廣告賣的最貴的時間段。更細緻一些，則涉及到了頻道忠誠度問題（祝建華,1997）。若有兩檔內容相似、播出時間段大致一樣、收視率也接近的節目，自然是擁有更多忠實觀眾的節目就更受廣告商青睞。

對於網站運營者來說，可根據使用者的時間分配來調整內容以黏著使用者。例如，如果用戶集中在上午9、10點鐘和下午5、6點鐘發帖子，近似於白領的時間分配習慣，那麼這個網站必須將自己的運營策略定位為服務白領。

再如，用戶如果更喜歡在工作日訪問某網站的A欄目，而在週末訪問B欄目，那麼打個比方：A欄目近似於日報，B欄目則更像週末報；因而兩個欄目的內容肯定要有所側重。

再者，即便對於普通線民來說，懂得一些關於時間使用模式的基本知識，也是很有好處的。例如，線民在Twitter或者微博發消息，什麼時候發出，才會有更多的人看到你的消息，從而吸引更多reply或者follower呢？當然，選在用戶比較集中的午餐或者晚餐時間效果會比較好。

第二，傳媒學者還關注這樣一個問題：不同的時間分配方式會對媒介使用者帶來什麼影響呢？這個問題之中蘊含的一條假設是：不同的使用模式（Use Pattern）會導致不同的媒介效果（Media Effect）。

當我們面對電視、電腦、手機等媒介，就如同一株暴露在陽光中的植物—對於喜陽的植物來說，曬太陽的時間越多，長得越好；對某些喜陰的植物來說，卻恰恰相反。然而，一個基本的假設是：曬太陽的時間長短會影響植物的生長。同樣的，在媒介面前的時間長短會影響人的生理心理等方方面面。例如，許多父母會覺得最好不要讓孩子花太多時間在電視、互聯網上面。一方面，怕孩子荒廢了學業；另一方面，擔心電視、互聯網上的有害資訊會影響孩子的身心。而早在上世紀20年代，美國佩恩基金會（Payne Fund）就開始支持一系列項目，這些項目旨在研究電影中的暴力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影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電視走進千家萬戶之時，一系列經典的研究，例如1967由美國南加州大學安尼伯格傳播學院教授喬治·格伯納（George Gerbner）所領導的團隊發現：電視中充滿了暴力。時至今日，有關電腦遊戲、社交網站等互聯網媒介對青少年影響的研究層出不窮。而這些研究往往會以這樣的文字開頭：「根據最新的互聯網使用調查，青少年平均每天花在互聯網上的時間為\*\*小時……」。可見，在媒介效果研究中，時間始終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變數。

秦潔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博士候選人



# 1月傳媒記事簿

## 中港文化衝突矛盾白熱化 台港兩地選舉情況各異

自從實施 CEPA 以來，香港經濟得到國內同胞支撐，但同時兩地的文化衝突亦愈來愈嚴重，一月份先後兩宗事件都反映兩地矛盾已趨白熱化，先是尖沙咀名店 D&G 被新聞媒體揭發禁止拍攝其櫥窗，而保安人員一句「內地人可拍照，香港人不准」的歧視港人、諂媚內地客的分化言論，令網上反應沸騰，終引發「萬人拍照」、「千人圍堵」的場面，最後逼使名



店道歉才平息風波。另一樁事件由內地孩童撒在火車廂上的點心麵引起，演化成北大教授怒罵港人是狗，再引發

有內地網民號召來港在港鐵進食，雖然事件沒有發生，但已令港人「仇內」意識進一步升溫。中港矛盾迅速激化，主要是傳統媒體和新式網絡發揮了相輔相成的重要作用。由於事件侵犯港人核心價值，傳統媒體詳細描述事情始末，而網絡將報道流傳，令沒有聽聞事情的人亦能得悉端倪。

一月初主導香港傳媒的政治新聞先有台灣大選，香港傳媒與全球其他媒介都有派員赴台觀戰；但在這次被稱為台灣歷來最文明的總統大選前夕，香港的民主派兩個黨的代表卻在台北動口又動手，可謂嚴重打擊香港泛民在全球華人社區的形象，亦令泛民內鬥進一步加劇。台大選後，傳媒的焦點轉往本地特首選情，唐、梁兩位參選人的民望支持度有不斷收窄的趨勢，在農曆新年後，本來領先民意的梁振英陣營更發動凌厲攻勢，叫陣要求雙方同場辯論，在媒介表現出的戰意亦愈濃烈；但唐英年陣營則堅持防守策略，繼續前後腳出席論壇。分析認為，唐營很大可能參考上屆做法，留待正式提名之後，各方亦商討辯論規則後，才作同場辯論。

[ + + + + + + + + + + + + + + + + + ]

## 新政府總部阻撓記者採訪 港新聞自由排名急跌20位

回歸前，政府總部本是一處公眾可自由出入的地方，記者可以隨意採訪。但以「門常開」為設計主題的新政府總部，啟用不足半年已問題叢生。當記者跟進與大樓有關的負面新聞時，卻多次遭到保安員粗暴阻撓採訪，例如籬手推撞干擾採訪，及後更變本加厲，「落閘」把記者拒諸門外，再有疑似便衣保安員發難出手遮擋鏡頭等。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亦已多次去信政府抗議，記協更曾多次要求與行政署會面，惟當局至今仍未有回應。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其後開腔解畫，企圖將阻撓記者採訪、打壓新聞自由，淡化為行政署和保安出現溝通問題，又稱行政署會就政府總部採訪安排與保安公司開會，不過他拒絕保證類似事件不會再次發生。

有立法會議員力促行政署長公開向記者道歉，並明確保證不會再無理阻撓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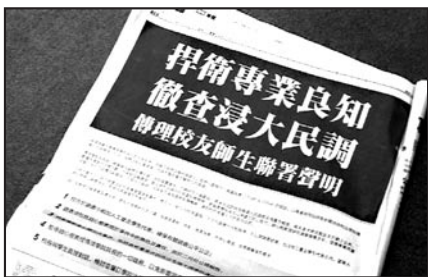
無國界記者月底公佈2011至2012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指暴力和輿論偵查在亞洲興起，指數顯示並沒有任何亞太國家在2011年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前10位。而香港的新聞自由情況亦急劇惡化，其排名由上年度第34位急降至第54位。組織認為，過去一年有香港記者被逮捕、騷擾，令香港新聞自由急劇惡化，政府新聞自由政策的變化令人擔憂。有新聞學者批評，港府對新聞自由操控變本加厲，如記者在立法會及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遭阻撓採訪，打擊新聞自由，又認為香港新聞界應團結一致反抗，並讓市民明白，新聞自由遭箝制，市民知情權和言論自由同樣受損。

[ + + + + + + + + + + + + + + + + + ]

## 數名學者相繼被左報密集抨擊 浸大「傳理調查」被指有政治目的

除了新聞自由，本地的學術自由亦出現隱憂，一直跟進民意研究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先遭中聯辦文體宣傳部部長郝鐵川炮轟，指港大民研的調查方法讓港人在中國人和香港人中作出選擇是不符邏輯。其次，亦有針對科大成名教授，指他支持五區公投以及接受法輪功刊物訪問的態度。在一月底，批評對象亦延伸至中大的蔡子強。有報紙統計，三大左報由去年十二月開始，對鍾庭耀的批評文章約有30篇，對成名的批評亦有十多篇，莫不是針對前者的「港人身份認同調查」，以及後者的文章。左報對學術界的狙擊，已經引起國際媒體如《華爾街日報》的注意，而立法會議員批評郝鐵川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由，要求他盡快收聲。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轄下的「傳理調查實驗室」一月中在網頁上公佈第二次特首選舉民調結果，指梁振英的支持度是27.8%，唐英年攀升至21.3%，二人差距6.5個百分點，但當時的調查只訪問了836人，幾日後又作出修正，指梁振英的最新支持度是29%，而唐英年支持度則為20.1%，應相差8.9個百分點。這個提早公佈的調查，有輿論質疑有人向浸大施壓要求發放有利唐英年的消息。引起社會人士議論紛紛。一月底，浸大傳理學院近八百名校友及師生在報章刊登聯署聲明，要求暫停學院院長趙心樹一切職務，及在事件調查小組加入工會及學生代表，認為事件損害學院公信力，亦令人質疑民調是否淪為選舉宣傳機器，達到校內高層人士的政治目的。



## 免費電視牌照仍待批出 城電高調部署挑戰無綫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春節前運用酌情權，讓按法例不符控制持牌人資格的前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成為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的主席及董事。根據《電訊條例》，由於李國章胞兄李國寶是電盈董事，因此李國章屬「喪失資格的人」，不能控制香港數碼廣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解釋，李國寶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不操控電盈的日常運作，故批准有關申請；有立法會議員指政府應交代批准理據，否則難免令人質疑私相授受。

有線寬頻、電訊盈科及香港寬頻等三家機構自零九年申請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一直未有結果，據報道廣管局已經同意，但有關申請有待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最終決定。適逢農曆新年假期，預計行會在二月才能敲定發牌詳情。雖然牌照未批出，但一場電視大戰已經在媒介醞釀，亞視根據法例賦予權利，向港府作出反對呈請，指利益受損，令審批新牌延阻逾半年，行政會議最終駁回亞視反對。而勝券在握的無綫高層表明其龍頭地位不怕被挑戰，直言收視拋離對手，又已委託第三者公司評估薪酬，希望透過加員工薪酬以穩定軍心。

三個申請者中，最高調的要數城市電訊。該公司主席王維基表示，公司已儲備數百小時韓劇，又聘請了三百員工，計劃今年再聘七百人，並到各大專院校招聘人才，又說三月將會開拍劇集。城電斥六億元在將軍澳興建免費電視及多媒體製作中心，料2014年首季啟用，暫租用葵涌及西貢廠房，古裝片則到內地攝製。王相信只要有人才和好節目，自然會有好收視，預計開播後收視會超過三成。另外，有線寬頻主席吳天海亦希望政府盡快批出新的免費電視牌照，令市民可以透過免費電視收看奧運，若有線寬頻獲發免費電視牌照，未來六年會投資十多億元。

[ + + + + + + + + + + + + + + + + + ]

[-] 梁麗娟  
傳媒評論員

## ☞ MEETING THE METADATA CHALLENGE

The correct use of metadata is crucial to productive content creation and cost-effective distribution. Its scale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not only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production but beyond final programme playout. One-size-fits-all Media Asset Management (MAM) systems have failed to give broadcasters the flexibility they need but lessons are being learned.

*BROADCAST*

*January 20, 2012*

## ☞ MAKING IT BIG IN JAPAN

Japan completed its digital switchover in July 2011, creating more channels an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independent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both locally and worldwide. As the second largest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producer in the world, the Japanese TV market is set to grow rapidly.

*BROADCAST*

*January 20, 2012*

## ☞ THE GREAT SCRAWL OF CHINA

The nation that invented paper is now in the midst of an online publishing boom that is making fortunes, changing lives and creating a truly populist literatu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tried their hands at “network literature”. The impact of e-publishing resonates far beyond the virtual world. Successful e-novels have sparked a frenzy of print versions and related record-breaking TV shows, movies and video games.

*TIME*

*February 13, 2012*

## ☞ MEETING BROADCASTERS' AUDIO MONITORING NEEDS

Aside from video signals, monitoring the quality and loudness of audio signals are also crucial. Next-generation audio monitor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within the broadcast chain. Audio processors are now capable of controlling loudness and dynamic range without affecting the original content.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January 2012*

## ☞ WHAT MORE TO EXPECT IN 2012?

HDTV, 3DTV, file-based workflows, over-the-top (OTT) services.....what lies ahead for 2012, and how will broadcasters take heed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presented by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January 2012*

## ☞ 「限」還是「建」- 「限娛令」與電視行業生態重建

國家廣電總局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提出，從2012年1月1日起，各衛視每周的娛樂節目不能超過兩檔，每年的選秀節目不得超過十個……。管理部門對全國電視業的這次宏觀調控，令電視節目進行多元創新成為業內的當務之急。「限娛令」的出台，對以娛樂打下江山的國內一綫強勢衛視會有怎樣的影響？而對於跟隨其後的衛視，能否抓住這個衛視排名大洗牌的契機，找到一條快速發展的新路？

*《南方電視學刊》*

*2011年第六期*